

# 论赵氏家族的政治危殆 与《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

李博昊

**内容提要** 《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曲子词集,其编纂虽是为在酒宴樽前聊佐清欢,但后蜀严酷的军政态势、编者赵崇祚困窘的家族处境,才是促成此书问世的深层动因。赵氏家族编纂《花间集》乃是为向蜀主孟昶传达醉心乐舞、忠心为臣之意。赵家几经动荡后平顺的政治结局则表明此书确实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家族政治危机的作用。

**关键词** 赵氏家族 赵崇祚 《花间集》

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 519087

《花间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前后,欧阳炯《花间集序》指出该书的编纂乃是为“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sup>[1]</sup>。古人多据此为说,而今学界也多认为《花间集》只是酒宴樽前聊佐清欢的乐歌集。然结合后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及编纂者赵崇祚的家族处境,编纂《花间集》或有着更深层的动因。

《花间集》成书之时,蜀境虽“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sup>[2]</sup>,然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下,政局暗流汹涌,形势可谓十分复杂。部分武将欺侮后主孟昶年少,居功自傲、骄蛮无礼。此令孟昶极为震怒,故以凌厉之攻势,削减武人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并逐步推行文治政策,以防止武将拥兵自立。《花间集》编纂者赵崇祚之父赵廷隐纵横疆场多年,军功赫赫,享有高官厚禄。然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仍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上。几经思量,赵氏家族终于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成书。此书的编纂非赵崇祚个人举动,而是一种带有政治深意的家族行为,用以取悦孟昶,并向其传达忠心为臣之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唐五代词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W036)阶段性成果。

[1][2][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影印)宋刻递修公文纸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 一、赵崇祚家族的政治危机与政治转型

赵崇祚家族在后蜀拥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赵崇祚之父赵廷隐曾追随后蜀先主孟知祥南征北战,功勋赫赫。同光四年(926),赵廷隐随孟知祥至成都,因功任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年,庄宗崩,孟知祥心生王蜀之志,赵廷隐亦是其增置军队的重要将领。长兴元年(930),赵廷隐率军扼剑州,破后唐石敬瑭军,遂为昭武军留后。长兴三年(932),赵廷隐又为孟知祥破东川节度使董璋。赵廷隐乃一员骁将,“拳勇有智略,高祖麾下无及者”<sup>[1]</sup>,为后蜀建国立下汗马功劳。但孟知祥在帝位仅6个月便病故,十五岁的孟昶随即登位。孟昶“少不亲政事,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sup>[2]</sup>。这些孟知祥的故人战功卓著,常恃功自傲。孟知祥在世之时,鉴于世乱用人之际,对其多优纵,此使得孟昶一登位即处于臣强主弱的态势。是以肃清居功自傲的将领,加强中央集权,成为孟昶稳定统治局面的当务之急。在此过程中,受遗诏辅政的赵廷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首先助孟昶除掉了与己素有嫌隙的大将李仁罕。

李仁罕在高祖时已恣为奢豪,见前蜀主宫嫔有国色便欲娶之,但惧为高祖所责,遂止。孟昶即位后,李仁罕跋扈之志益增,其恃功生骄,虽已官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却仍求判六军<sup>[3]</sup>。“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sup>[4]</sup>,展现出一种迫不及待、志在必得的姿态。孟昶不得已,“曲徇其请,加中书令,判六军事”<sup>[5]</sup>。孟昶内心虽不胜其忿,不愿遂李仁罕之意,但鉴于自身立足未稳,只能妥协。然在令李仁罕“判六军事”的同时,孟昶又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李仁罕副将<sup>[6]</sup>,意欲用赵廷隐对李仁罕构成牵制之势,防止李仁罕在军事上权柄过大,只手遮天。

赵廷隐深知孟昶对李仁罕心有忌惮,便欲借孟昶之力诛杀李仁罕。《锦里耆旧传》记赵廷隐虑李仁罕“难作,请杀之”<sup>[7]</sup>。《十国春秋》曾记赵廷隐“怂恿”后主杀李仁罕<sup>[8]</sup>。《资治通鉴》则谓后蜀明德元年(934)冬,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等潜李仁罕有逆志,孟昶遂令韩继勋与赵季良、赵廷隐等人谋划,在李仁罕入朝之时,使武士执而杀之,“诏暴仁罕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皆伏诛”<sup>[9]</sup>。

李仁罕之死显露出孟昶凌厉果断的政治手腕,在朝廷武将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蜀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对于孟昶继位,本持不屑与观望的态度。不仅“留与亲戚燕饮逾旬”,不按时入朝觐见,甚至“至成都,称足疾,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sup>[10]</sup>,颇有自傲之心。但当其知李仁罕被诛杀,即日入宫释杖而拜。此足见孟昶以儆效尤之功效。纵然李肇在李仁罕死后极力表现出谦卑的一面,但孟昶内心仍旧忿忿。加之“左右以肇倨慢,请加刑”<sup>[11]</sup>,孟昶遂罢李肇军务,改之为太子少傅,并将其徙邛州。李肇自此远离了权力中心。至广政八年(945),七十岁高龄的李肇死于偏远的邛州。

在后主以雷霆之势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态势之下,恃功自傲不加收敛,或会招致杀身之祸。李仁罕之甥张业亦是后蜀开国大将,在孟昶即位之初,为武信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一如李仁罕般欺后主年少,日益骄奢无度。“强市人田宅,藏逆亡命,又与私第置狱系负责者,或历年至于瘐死”<sup>[12]</sup>,蜀人大怨。张业之子继昭官检校左仆射,其好击剑,常与僧同访善剑者,亦使孟昶对张业的动机心存疑虑,遂“俟其入朝执杀之,下诏暴业罪恶,籍其家”<sup>[13]</sup>。时为广政十一年(948),距李仁罕死十五年。

李仁罕、李肇与张业都曾随孟知祥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清人吴任臣言此三人与赵廷隐、

[1][3][5][8][11][12][1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7页,第759页,第759页,第759页,第761页,第760页,第760页。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4页。

[4][6][9][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24页,第9124页,第9125页,第9124-9125页。

[7][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8页。

赵季良均为“高祖创业勋臣，史所号五节度使”，但“仁罕伏辜、业不良死，肇老临邛”，他们“召祸取尤”皆因功高志满，“无不自己作之者也”。两赵虽亦“功绩茂矣”，却能“运筹敌忾，克保始终”<sup>[1]</sup>。此二人别于他者得以善终，显然与他们的政治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赵季良“幼涉书史，长于吏治”<sup>[2]</sup>，为高祖谋士。佐孟知祥拒后唐、破董璋、平东川，于孟蜀立国有定策之功，又曾拥戴孟昶继位，勋绩显著。然在后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态势之下，其于广政三年（940）主动请求与宰相毋昭裔、张业分判三司，以绝孟昶之虑。赵季良“性情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sup>[3]</sup>，温良恭俭且知进退，此或为其离灾远祸的一种方法。

赵季良为军事谋臣，选择主动疏离权力中心，自然容易赢得孟昶的信任。但赵廷隐乃骁勇善战、夙怀韬略的武将，在军事将领常拥兵自立的时代，孟昶势必会对其产生更强的戒备之心。如何避免君王的猜忌与打压而得以善终，是此时赵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此不仅因为赵家在铲除李仁罕后，军事地位愈显突出，更因其时赵家奢豪的生活状态，较之李仁罕与张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孟昶继位之初所提倡的节俭是有所抵牾的。

早在孟蜀立国之时，赵家即以生活侈丽而闻名。《北梦琐言》记：“伪蜀王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sup>[4]</sup>又记孟蜀开国之时，赵氏家宅水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岐，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sup>[5]</sup>。赵家莲花呈瑞像引众人羡叹，其“画图以进”虽为蜀主观赏，却似有炫耀之心。“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岐分三朵。蜀主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sup>[6]</sup>后蜀官廷莲花亦呈祥瑞之兆，蜀主大宴群臣共赏之，则有与赵家媲美之意。

广政初年时的赵廷隐“久居大镇，积金帛巨万，穷极奢侈，不为制限，营构台榭，役徒日数千计”<sup>[7]</sup>。而此时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sup>[8]</sup>，生活的精致富丽程度远不及赵家，赵家似有压主之势。此亦隐隐透露出赵家与孟蜀王室之间一种强臣震主却又暂时保持平衡的微妙关系。李仁罕之死虽遂赵廷隐之心意，却亦令其意识到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深为皇室所忌惮，稍有不慎，即会步李仁罕之后尘。故赵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恪守为臣之礼，在军事上则凸显忠诚，以求自保。

明德四年（937）冬十月，“蜀人譙本冒母，忽化为虎奔城上，兼侍中赵廷隐射杀之”。赵廷隐言于孟昶曰：“虎，山林之兽，而人化之，入于城市。虎旅中虑有不轨之士。”果然当夜卫军张洪谋叛，翌日“为其党所告，伏诛”。张洪为人刚勇绝伦，军中号为张大虫，此番其被诛，诸人多以为乃“虎上城之验”<sup>[9]</sup>。赵廷隐藉射虎之事提醒孟昶警惕卫军，向孟昶昭示了忠心之意。同年，后晋军侵利州，至剑门，赵廷隐领兵拒退之<sup>[10]</sup>。此又是其效忠王室的一个表现。

广政二年（939），后周军队来犯，赵廷隐次子赵崇韬和控鹤指挥使袁可钧同为北面招讨。赵崇韬“率励将士，行阵整肃。士卒有黥其额为斧形者，号曰‘破柴’。周师前锋屡为崇韬所败，至归安而退。”<sup>[11]</sup>在这场战役中，赵家立有军功，表现虽符合孟昶心意，但仍未完全赢得其信任。此时赵廷隐官武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然朝廷出于牵制权臣的考虑，令“节度使多领禁兵，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sup>[12]</sup>。节度使的权力正逐步被削弱。这令赵廷隐深刻认识到手握兵权必会隐患重重。为求长久安宁，赵氏家族在深思熟虑后，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即便是转型的产物，用以取悦孟

[1][9][10][1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1页，第709页，第709页，第711页。

[2][3][7][11]〔宋〕路振：《九国志》，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0页，第3300页，第3303页，第3303页。

[4][5][6]〔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2页，第182页，第182页。

[8]〔宋〕佚名：《五国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页。

昶,并向其传达醉心乐舞、忠心为臣之意。

## 二、《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

孟昶虽然性情宽厚,对待震主的武将却毫不留情,其韬光养晦,隐忍不发,择时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剪除权臣,加强了中央集权。尽管其已除掉大批强将,但对武人仍心存忌惮。对此,深谋远虑的赵廷隐明了于心。为求全身远祸,这个战功显赫的家族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其编纂目的有二。

第一,《花间集》的编纂乃是为了进献宫廷教坊,以趋奉孟昶。

后蜀宫廷喜乐舞,如花蕊夫人所描绘的一般,“总是一人行幸处,彻宵闻奏管弦声”<sup>[1]</sup>,“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sup>[2]</sup>。蜀宫还设有乐舞表演机构——教坊<sup>[3]</sup>。其中乐工颇多,技艺精良。《宋史·乐志》记:“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sup>[4]</sup>西川乐工人数之众、技艺之精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蜀宫不仅好乐,且有较高的欣赏水平。

然美中不足的是,其时教坊所歌之辞多承“南朝宫体”、“北里倡风”<sup>[5]</sup>,格调卑俗。此类拙俗鄙俚的作品与后蜀宫廷高雅的文化品尚格格不入。孟昶及其宠妃花蕊夫人皆能诗善赋。孟昶好文,曾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sup>[6]</sup>,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就此诞生。孟昶“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sup>[7]</sup>,词作亦有流传,存留的“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这两句词,已脱“月貌花容”之俗境,进入了“美”的另一境界<sup>[8]</sup>。花蕊夫人亦长于诗咏,曾仿王建作宫词百首,时人多称许之<sup>[9]</sup>。百首《宫词》在文学史上评价颇高。宋人胡仔言中唐诗人王建《宫词·御厨不食索时新》与花蕊夫人的《宫词·厨船进食簇时新》“二词纪事则异,造语颇同,第花蕊之词工,王建为不及也”<sup>[10]</sup>。《宋诗钞》亦赞花蕊夫人的《宫词》“清新艳丽,足夺王建、张籍之席。盖外间摹写,自多泛设,终是看人富贵语,故不若内家本色,天然刘丽也”<sup>[11]</sup>。品味雅致的后蜀宫廷自是希望歌伎的唱辞风流蕴藉、飘逸含蓄。孟昶为此还常制新曲。花蕊夫人《宫词》言: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官才唱未知名。尽将麝篆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sup>[12]</sup>

舞头皆着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墀。<sup>[13]</sup>

孟昶御制之词常在蜀宫奏唱,蜀宫也需要一部高雅的乐歌集以丰富教坊乐伎的曲目。这就为臣子献乐提供了机会。

[1][2][12][13]徐式文:《花蕊宫词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9页,第110页,第40页,第96页。

[3]后蜀宫廷设置教坊。《十国春秋》记杨千度善戏猴,“常饱养十余头,习人言语。一日,内厩猕猴维绝,走殿上阁,后主令人射之,不中,乃命千度执之。千度谢恩讫,猴十余头皆向殿上叉手拜揖。后主大悦,赐千度绯衫钱帛,收入教坊。”又记广政十五年(952)夏,孟昶大宴群臣,教坊优人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象。后蜀教坊含各种杂耍戏剧,但仍以伎乐娱乐为主,乐舞当以俗乐居多。故花蕊夫人《宫词》有“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宣索教坊诸伎乐,傍池催唤入船来”之句。

[4][6][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47-3348页,第1446页。

[5][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影印)宋刻递修公文纸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7][清]张宗橐编、杨宝霖补正:《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8]夏承焘、臧克家、缪钺等:《苏轼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页。

[9][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24页。

[10][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

[11][清]吴之振等:《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57页。

在唐代,臣下献词乐之举屡见不鲜。玄宗时期,李太白曾应制《清平乐》四首以满足宫廷追逐风雅的文化品尚<sup>[1]</sup>;温庭筠的《菩萨蛮》亦被呈给宣宗品赏<sup>[2]</sup>。其时更有人因献词乐而得赏得官,《本事诗》记“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词”,日用撰词,中宗以绯鱼赐之<sup>[3]</sup>。《本事诗》亦载“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朱绂未复。尝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撰词起舞,因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sup>[4]</sup>。《大唐新语》记“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待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sup>[5]</sup>。此皆是以歌乐谀上求官求赏之范例。唐时少数民族亦会通过献乐来表达友好及臣服之意。《唐会要》记贞元时,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sup>[6]</sup>,用以传达永为汉臣的心愿。

赵廷隐不欲得官求赏,惟想取悦孟昶。其曾向宫廷进献乐工,伶人孙延应即由赵家选送入教坊,以作为向孟昶示好的纽带<sup>[7]</sup>。而当两蜀之时,社会编书之风盛行。前蜀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王仁裕,以文辞知名于秦陇之间,曾集平生所作诗万余首为百卷,号《西江集》,另编《国风总类》五十卷<sup>[8]</sup>;前蜀王承范编《备遗掇英》二十卷;韦庄亦承姚合《极玄集》而有《又玄集》。或受此启发,赵家尝试编纂一部高雅的乐歌集进献教坊,谀奉孟昶,《花间集》即或是赵家继伶人之后向宫廷的又一次献礼。

第二,《花间集》的编纂乃是迎合后蜀文治政策,以彰显为臣之心。

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言“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sup>[9]</sup>。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sup>[10]</sup>。他未有披挂上阵、血染疆场的经历,身上少有武将的专横,却多了文人的儒雅。其兵不血刃,通过“擒王”这一简单有效的方式,扭转了武人跋扈恣睢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针对五代时期军事将领常拥兵自立的局势,孟昶着力摒弃“武功”,提倡“文治”。此种抑武事而扬文教的右文政治是孟昶自继位起一以贯之的政策。孟昶提倡儒学,主张以文教礼乐治民,其通过刻经修史、镂印书籍、兴办学校等推行教化。《花间集》虽是一部乐歌集,却也要符合这种文教的趋势。

《花间集》由赵廷隐长子赵崇祚<sup>[11]</sup>主持编纂。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花间集》编纂成书之时,其于后蜀担任卫尉少卿。《唐六典》言卫尉少卿从四品上,佐卫尉卿“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署”,“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其羽仪、节钺、金鼓、帷帘、茵席之属”<sup>[12]</sup>。卫尉少卿这一官职于隋唐及两宋皆有设置,掌管仪仗帐幕。后蜀职官多承唐制,卫尉少卿之职或少有变动。赵崇祚熟知后蜀宫廷的政治政策与审美趣好,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及较高的文化地位。其与年德素长、时号宿儒的大理少卿刘嵩、国子司业王昭图等人为忘年友<sup>[13]</sup>,并广交饱学之人、墨客雅士,经过反复斟酌,认真讨论,终成一部《花间集》。欧阳炯《花间集序》

[1][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影印)宋刻递修公文纸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3页。

[3][4][唐]孟棻:《本事诗》,[上海]文艺小丛书社1933年版,第68页,第69页。

[5][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

[6][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页。

[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711页。

[8][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2页。

[9][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成都文类》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348页。

[10][宋]王明清:《挥尘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2页。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崇祚字宏基,事孟昶为卫尉少卿……蜀有赵崇韬,为中书令廷隐之子。崇祚疑即其兄弟行也。”《九国志》记载赵庭隐有“子崇祚、崇韬”。成都赵廷隐墓出土的墓志则明确说明其长子为赵崇祚。

[12][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日]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13][宋]马永易:《实宾录》,王兆鹏《词学史科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5页。

言此集可“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sup>[1]</sup>。“金母”即瑶池西王母。《墉城集仙录》载:“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sup>[2]</sup>欧阳炯以西王母宴周穆王来比拟后蜀宫廷的宴饮,暗含《花间集》中作品质量的上乘。《花间集序》又言集中作品亦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sup>[3]</sup>。“西园”本是天子苑囿。汉末曹操曾在临漳邺县旧治修建西园,乃一风雅集会之所。《文心雕龙·时序》言“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sup>[4]</sup>,曹丕《芙蓉池作》言“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sup>[5]</sup>,曹植《公宴》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sup>[6]</sup>。西园雅集之士或为曹氏宗亲,或为政界新要,带有政客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晋代顾长康曾作《清夜游西园图》,描绘了这一盛景。西园雅集情志脱俗,格调高逸,影响很大。后蜀孟昶乃一风流儒雅之士,其宫廷之聚亦当效仿西园之集,佐欢之曲必舍《莲舟》而择《阳春》,以符合孟氏之身份与趣尚。宋绍兴十八年晁谦之刊本欧阳炯序中“庶以《阳春》之甲”<sup>[7]</sup>的言辞,表明《花间集》超越《阳春》的至高品位。

赵氏家族带着多种动机编纂《花间集》,但其根本目的乃是向孟昶传达自家醉心歌舞,忠心为臣之意。后蜀抑武扬文的政治倾向使老谋深算的赵廷隐意识到,惟有疏离于政治,才不会落得如李仁罕、张业、李肇一般结局。为此赵氏家族尝试由武向文的转型。此时频繁出入赵家门庭的已非勇武矫健的军士统帅,而是文人墨客、僧侣道众。《北梦琐言》记赵家南北宅“后枕江渚,池中有二岛屿,遂磬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尘尾者、谭诗论道者”<sup>[8]</sup>,格调高尚雅致,文学气息浓厚。赵家还蓄养诸多乐伎,乐舞生活十分繁盛。成都赵廷隐墓出土的乐器与乐俑,展示出赵家歌舞享乐生活的多彩与奢华。赵廷隐墓室西侧室出土了二十余件彩绘伎乐俑,分乐伎俑、舞俑、歌伎俑<sup>[9]</sup>,所著衫、裙富丽鲜艳,多描金。乐俑所执乐器有琵琶、箏、笙、笛、箫、排箫等;歌俑神态尊贵,头饰金簪,位于众乐俑中部;舞俑中二件为柔舞俑,着女装,姿态柔和优美,一件为健舞俑,着男装,姿态干练有力<sup>[10]</sup>。如此陶俑皆是价格不菲的订制品。个体独立的同时,组建成一个完整的乐队,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色彩及工艺远高于前蜀王建永陵棺床上的乐伎浮雕<sup>[11]</sup>。出土乐俑展示出赵氏家族对于乐舞的沉醉,而醉心乐舞乃是在向蜀主孟昶传达这个家族顺应中央加强集权政策、由武向文转型的心态,传达着这个家族疏离政治、忠心为臣之意,折射出的是赵家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

赵氏家族“广汇众宾”、“时延佳论”,于成都高调编纂《花间集》,声势不可谓不大矣,此举定会引起孟昶之重视,受到宫廷之关注。赵氏家族动用大量人力为宫廷教坊进献唱本,投合的是孟昶文学喜好,逢迎的是孟昶的文治政策,昭示的是武将家族的转型,表达的是忠心为臣之意。此是赵家身居高位、全身远祸的一种方法。编者赵崇祚在《花间集》中未留下只言片语,作为赵廷隐的节度判官的欧阳

[1][3][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影印)宋刻递修公文纸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57页。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页。

[5][6]余冠英:《三曹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第37页。

[7][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影印)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8][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2页。

[9]陈剑、邱艳:《四开坝子:多学科整合的个案研究与龙泉后蜀赵廷隐墓的发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讲座侧记》,〔成都〕《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10]王毅、谢涛、龚扬民:《四川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发掘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9日。

[11]《成都发现五代时期宋王赵廷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2011年5月4日。

炯<sup>[1]</sup>,亦不会于序言中公然表达政治目的,此乃是赵家与王室的一次心照神交。精心编纂的《花间集》,即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 三、《花间集》与赵家政治危机的消弭

欧阳炯《花间集序》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四月,表明其时《花间集》基本编纂完成。此时后蜀立国八年,赵廷隐虽官武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但非驻于辖区,而是受孟氏之令居于成都,军事权力实被限制。广政三年(940)五月,地震。孟昶问“‘顷年地何频震?’群臣对曰‘道地静而屡动,此必强臣阴谋之事,愿以为虑。’”<sup>[2]</sup>同年六月,即发生牵涉赵家的伶人谋逆事件。

广政三年(940)六月,“教坊部头孙延应、王彦洪等谋逆,伏诛。延应,赵廷隐伶人,以技选入教坊,有妖尼语之曰:‘君贵不可言。’至是谓其徒胡圭曰:‘今王氏苦竹开花,侯侍中家马作人言,银枪营中井水涌出,地又数震,正叛乱之兆也!’于是合十二人,期以宴日持仗为俳优,尽杀诸将而夺其兵。为其党赵廷规所告,尽禽焉。”<sup>[3]</sup>赵家选送的伶人谋逆案发生于中央加强政治集权的敏感时期,依照孟昶多疑的性格及其对李仁罕等武将的处置方式,赵氏家族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且此时赵廷隐并未完全得到孟昶的信任,遭到严厉的制裁似乎成为了必然。但事实上赵家并未受到太大惩处,只是广政四年(941)春二月,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检校官,并罢其节度使”,同年三月,后蜀“由文臣知节度事”<sup>[4]</sup>。五月,孟昶下诏提倡节俭。《挥尘录》记“蜀主能文章”,曾“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诏曰:

朕念赤子,吁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而为戒,体朕深思。<sup>[5]</sup>

孟昶此举或意有所指,生活奢华的赵家极有可能在其训诫之列。但警告这种惩罚方式的力度相对于孟蜀立国之初对震主武将的流放和夷族而言,可谓微乎其微。其中除却告发谋逆的赵廷规或为赵廷隐一家兄弟行以外<sup>[6]</sup>,赵家顺应孟昶文治政策、由武向文的转型发挥了令孟昶消除疑虑的重要作用。精心编纂的《花间集》,即是转型的一个表现。此书极大程度地迎合了孟昶的文学喜好与文治政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花间集》或令孟昶感知到赵氏家族由武向文转型的用意,对于赵氏家族的信任程度有所加深。

广政十一年(948)秋七月,“安思谦密告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夜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入朝,极言廷隐无罪,得免。”<sup>[7]</sup>不久,赵廷隐称疾,请求解除军职,孟昶许之。但仍旧第册其为宋王,是后蜀唯一的异姓王。赵廷隐年迈经岁不能起,孟昶赐肩舆入朝。“既谒见,昶感动涕泣,赐金沃盥及绘锦,加太师”<sup>[8]</sup>。广政十三年(950)冬赵廷隐薨,谥“忠武”<sup>[9]</sup>。年少骁勇、颇有父风的赵崇韬袭父任,领卫圣诸军使。广政十五年(952)三月,以赵廷隐别墅“为崇勋园,幅员十余里,台榭亭沼,穷极奢侈”<sup>[10]</sup>。广政二十一年(958)左右,孟昶一女适赵崇韬之子,广政二十七年(964)宋师来袭,

[1]时任武德军节度判官的欧阳炯是文官,掌判诸曹事物。节度判官的担任者多为节度使之亲信,或为节度使所聘任的知名文士,是节度使属下最重要或最亲近的文臣。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2页。

[2][3][4][7][9][10][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页,第710-711页,第711页,第716页,第758页,第721页。

[5][宋]王明清:《挥尘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2页。

[6]饶宗颐:《词集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0页。

[8][宋]路振:《九国志》,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页。

赵崇韬与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宋军于汉源。赵崇韬策马先登,宋师大败。赵崇韬力战不止,兵器皆断折,犹以手击杀数人,后为宋师所擒<sup>[1]</sup>。后蜀的赵崇溥,广政中为威武军都监,与赵崇祚或为一家兄弟<sup>[2]</sup>。赵崇溥在广政十八年(955)后蜀与后周的秦凤之战中,为后周所擒,不食而死<sup>[3]</sup>。后蜀亡后,花蕊夫人“心未忘蜀,每悬后主像以祀,谎言宜子之神。《张仙挟弹图》即后主也,童子为太子元喆,武士为赵廷隐”<sup>[4]</sup>,足见赵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而赵廷隐的心腹欧阳炯广政十二年(949),除翰林学士。十三年(950),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广政二十四年(961),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后主手诏嘉美,賚以银器锦彩”<sup>[5]</sup>,并从后主归宋。此亦可佐证赵家政治上的平安过渡。

赵廷隐过世后,孟昶厚葬之,其墓室规模很大,约270m<sup>2</sup>,内壁有凤鸟、卷云等彩绘壁画。墓室中棺台为须弥座式,长7m、宽3.35m、高0.56m<sup>[6]</sup>。与前蜀前主王建永陵中长7.45m、宽3.36m、高0.84m的棺台相差无几。永陵中出土了石质圆雕的王建像,赵廷隐墓则在主室与后室间,设有一个长1.2m、宽1m、高0.3m的微缩版陶质庭院,卧室、厢房等一应俱全,或是模仿墓主生前的居所制成。庭院中墓主人坐像身着红色官服,另有五个站立的服侍俑<sup>[7]</sup>。陶俑在五代墓葬中较为罕见,永陵及孟知祥与福庆长公主合葬的和陵中均未发现。而赵廷隐墓主室四角出土了两个文官俑、两个武士俑、六个神怪俑,神怪俑还包括金鸡、玉犬、观风鸟、雷公俑等多种造型<sup>[8]</sup>。墓中另有高、宽均为1m的赵廷隐墓志,在目前出土的后蜀墓志中,仅权臣张虔钊墓志大小与之相同<sup>[9]</sup>。孟知祥的和陵中曾出土后唐庄宗李存勖胞姐福庆长公主的墓志,形制亦不过高1.08m,宽1.1m<sup>[10]</sup>。足见赵廷隐墓乃经过精心设计,规格很高,此可佐证赵家在后蜀的重要地位。

赵氏家族在后蜀加强中央集权的严酷形势下,为求自保,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在凸显军事忠诚的同时,动用大量人力、花费诸多精力,为宫廷编纂《花间集》,向孟昶传达沉醉乐舞、忠心为臣之意。孟昶亦感知到赵家的良苦用心,终后蜀之世,皆善待赵家。这个军功显赫的家族在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中,凭借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君王的信任,保全了自身。而在这个过程中,精心编纂的《花间集》或许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甚至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平 啸]

[1][宋]路振:《九国志》,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页。

[2]饶宗颐:《词集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0页。

[3][4][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6页,第748页,第776页。

[6]参见 沈仲常:《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07-108页。陈剑、邱艳:《四开坝子:多学科整合的个案研究与龙泉后蜀赵廷隐墓的发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讲座侧记》,〔成都〕《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7]《成都发现五代时期宋王赵廷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2011年5月4日。

[8]陈剑、邱艳:《四开坝子:多学科整合的个案研究与龙泉后蜀赵廷隐墓的发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讲座侧记》,〔成都〕《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9]后蜀孙汉韶墓志为82×82cm,许璠为77×77cm,徐铎为78×79cm,韦政文为61.7×62.3cm。参见袁曙光《略论〈大唐福庆长公主墓志〉的几个问题》,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19页。

[10]鍾大全:《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12-114页。